

■政治学理论

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

——兼评印度尼赫鲁时期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牛慧娟, 洪 明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作者简介] 牛慧娟(1978-), 女, 湖北荆门人,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政教系硕士生, 主要从事中西现代化比较研究; 洪 明(1955-), 女, 江苏沭阳人,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政教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西现代化比较研究。

[摘 要] 尼赫鲁时期印度仍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 其经济发展缓慢, 但它却保持了高度的政治稳定, 其中, 中产阶级的作用不可忽视。中产阶级对尼赫鲁时期政治稳定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政治稳定提供社会基础; 中产阶级的价值取向为政治稳定提供思想基础; 中产阶级对国家政策的影响为政治稳定提供政治基础。

[关键词] 中产阶级; 政治稳定; 尼赫鲁; 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 D 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28(2003)01 \ | 0052-06

—

关于什么是“中产阶级”, 对这一概念的界定, 学术界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一般认为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一词最早见于 1812 年的《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 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第 273 页)。但同时马克思也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 马克思生前曾多次使用“中间阶级”、“中等阶层”、“中产阶级”等概念, 据初步统计,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9 卷)中, 有 83 处直接论及中间阶层。马克思认为“中间等级, 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 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 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 以免于灭亡。所以, 他们不是革命的, 而是保守的”^[1](第 283 页), 但他“并没有把这个中间阶层看成是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同样重要的一个阶级而存在”^[2](第 20 页)。由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特点, 他对中产阶级问题的重视和研究都有一定的局限。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针对西欧、北美雇佣脑力劳动者增加的情况, 修正主义理论家伯恩斯坦认为, “在现代资本主义, 小资产阶级不但没有消失, 而且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都在增加”^[2](第 27 页)。他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相当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 由此伯恩斯坦得出结论: 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正趋于缓和, 所以他反对革命, 倡导渐进的社会改良。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及伯恩斯坦所提到的中间阶层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中产阶级, 同时由于财富的积累、社会公平观念的普及、社会流动频率的加快、权力与财富的分离, 西方社会结构也由

“金字塔”型的社会向“橄榄型”的社会过渡，中产阶级成为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分层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米尔斯认为中产阶级有新旧之分，旧式的中产阶级主要包括农场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这些人属于有产阶级，而新中产阶级主要是一些“白领”，即经理、推销员和办公人员等，他认为这种变化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3]（第85页）

笔者认为，广义而言，中产阶级存在于所有阶级社会，无论财富的占有和社会地位，都居于社会的中间。狭义而言，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相伴随的。本文探讨的是狭义中产阶级概念。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因中产阶级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呈现动态。由于历史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不同国家和在同一国家的不同阶段，中产阶级的构成、富裕程度及与此相关的价值取向等指标有很大差异。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特征：首先是“中等”，即无论是所占有的财富、收入、社会地位等都处于富裕阶级与贫困阶级之间；其次，中产阶级成员主要从事非生产性的劳动，职业大多为商人、农场主、自由职业者、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经理及职员等。再次，中产阶级人群经济地位的相似性也决定他们具有一些相同的价值取向及共同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准则，如追求民主自由、渴望社会稳定、趋于保守等。

而关于如何界定政治稳定，目前在政治学界众说纷纭，尚无统一论。比较政治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尔蒙德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研究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认为政治不稳定产生于政治体系的能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脱节。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稳定在于政治系统有能力承受外部环境对系统的压力，他认为任何持续的政治系统必须完成两个基本功能：其一，能够为一个社会分配价值；其二，设法使大多数成员至少把这种分配作为义务予以接受^[4]（第28页）。西方研究政治稳定理论的权威人物以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形成了一套关于政治稳定的经典界说和判断标准。他认为政治稳定是公民政治参与能力与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平衡关系。认为发展中国家公民参与政治的要求一旦超出了制度化载体所能容纳的范围，则社会政治运动必然会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发生。

马克思主义者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人类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动力为视角，认为政治稳定从实质上讲是指在某一政治形态中或其发展的某个阶段，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之间基本相适应的有序状态。政治稳定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范畴，由于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不同，他们在界定政治稳定时侧重点也不相同。本文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政治稳定是政治体系在变革过程中，不存在全局性的政治动荡与政治骚动，国家能维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政策具有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

关于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一般认为中产阶级的发展与壮大对促进政治稳定有着积极意义。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即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形式的共和政体。因为他认为中产阶级可以防止极富阶级的骄横和极贫阶级的“越轨”，保持政治的稳定。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也提到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他认为“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间阶级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5]（第264页）。中产阶级对政治稳定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经济上来说。中产阶级拥有中等资产，有较稳定的中等水平收入，生活状况良好，他们一般从事非生产性劳动，不直接剥削他人的劳动成果。同时他们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保证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随着他们自身力量的不断壮大，他们成为上等富裕阶级和贫困人口之间的一支平衡力量，防止两极分化，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

第二，从政治权力上来说。中产阶级一般处于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和直接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工人阶级之间，他们虽然不像统治阶级那样可以凭借手中的政权或经济控制权对社会的发展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但他们往往在各行业从事具体的工作，直接掌握着生产力和文化设施，能够凭借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所从事的职业对国家政策的制定、方针的选择施加一定的影响，起延缓或促进作用，这一定程度上对国家政策的实施起到了监督作用，有利于国家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第三，从价值取向来看。中产阶级虽然并不表现为明确的、具有显性特征的集团，但他们经济地位

的相似性决定了他们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普遍认为中产阶级的价值取向比较保守、温和,崇尚中庸,追求自由民主,渴望社会稳定,不希望革命。而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这是保持政治稳定的思想原因。

第四,从受教育程度上来看。中产阶级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他们与广大下层群众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关心他们自身的利益以外,他们还关注公共事业。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生活习惯良好,讲究卫生,注重仪表和言谈举止,他们这些好的行为为其他人做出了表率,因而中产阶级促进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这也是政治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以上从宏观上理论地分析了中产阶级、政治稳定以及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下面以印度尼赫鲁时期为切入点,分析一下尼赫鲁时期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二

1947 年印度刚独立时,仍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其经济发展缓慢,人均收入也很低,但它却保持了高度的政治稳定,这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中产阶级的作用不容忽视。尼赫鲁时期中产阶级对政治稳定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是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

印度刚独立时,中产阶级在 3.5 亿人口中占 1000 万^[6](第 146 页)。其主要成员是政府官员、商业经理、中等水平农户、有资格的专家,如医生、工程师、律师、在大城市学校和高等教育部门的教师、新闻工作者、部分或充分受教育的人和私营部门的白领食薪阶层。^[7](第 2 页)年收入在 1200 ~ 12000 卢比之间的人即可跨入中产阶级行列,中产阶级能够迅速发展和壮大是由客观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

其一,土地制度的改革,改变了农村中的阶级关系。土地制度改革废除了柴明达尔“中间人”的地权制度,这样一些永佃农摆脱了柴明达尔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成为农村的实际统治者。“这些农业家阶级渴望着中产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方式”^[7](第 52 页),一旦条件成熟,他们就迅速地向资本主义经营地主转化,成为农村中的中产阶级。其二,国家重视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尼赫鲁时期印度曾提出过两次工业政策文件,即《1948 年工业政策决议》和《1956 年工业政策决议》,并拟定了一系列促进其发展的政策,为他们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其三,文官制度的改革,政府机构设置的不断扩大。独立后印度政府对文官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重建,1951 年“全印文官法”和 1956 年“中央文官法”的制定扩大了成为文官的渠道,把更多的人吸收到文官队伍中来。其四,印度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独立后印度政府重视高等教育的政策使高等教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印度刚建国时,全国著名的大学有 25 所,先后培养学生以 10 万计,到 1960-1961 年度大学数增加到 44 所,学院有 1542 所,入学人数达到 55.7 万人^[8](第 142 页)。大学是通向中产阶级的阶梯,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部分走入了中产阶级队伍。

中产阶级自身力量的壮大伴随着他们本身的一些特性使中产阶级的作用开始显现,成为尼赫鲁时期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土地制度改革的结果是发展了农村中下层地主和富农的力量,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这些农村的中产阶级开始走出农村,加速了城市化运动。农村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与发展意味着贫困人口的相对减少,并且他们成为大多数人的典范,从而带动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这有利于逐步解决国家的贫困问题。其次,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中小企业成为印度独立时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而经营中小企业的多数人是中产阶级,他们一般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技能,并且能认同当时社会的主要政治思想,他们的经营方针、方向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引导消费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数量多、遍及广,其影响力也很大,他们的经济实力处于垄断财阀、大企业和贫困人口之间,成为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力量。再次,印度文官队伍的壮大意味着直接参政的人增多,而且对文官所进行的培训也提高了文官的参政水平和办事效率。这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防止中央政府部门腐败,使其所制定的政策更好地服务于各阶层的利益;另一方

面,文官素质的提高可以促进政治制度化,而政治制度化的程度越高,其政治不稳定的系数就越小,也就意味着政治更加稳定。最后,高等教育的发展提高了整个国民的素质,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精神文明的榜样,有利于缓和国家的种族矛盾和宗教冲突。

(二)中产阶级的价值取向是政治稳定的思想基础

印度中产阶级从17世纪开始萌芽到尼赫鲁时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他们共同经历了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民族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在不断地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同时,又受着本国甘地、尼赫鲁思想的冲击,同时他们还受着印度教教义的熏陶,在这几种思想力量相互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印度中产阶级形成了复杂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结构。这成为印度政治稳定的思想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追求自由和民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教育使中产阶级逐渐接受西方的哲学家如培根、孟德斯鸠等人所宣扬的理性原则和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羡慕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这一方面培养了他们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要求独立自主的民族情绪;另一方面,他们渴望在印度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这一思想遗产一直延续到印度独立后,因而追求自由和民主成了尼赫鲁时期印度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对议会民主制的选择最有利于印度社会的政治稳定,这也是由印度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其一,印度是一个多元化的复杂社会,人种、民族、语言、宗教、信仰、哲学流派极其多样,与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现的多元价值观、言论信仰自由原则有某种亲合性。其二,印度历史上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控制能力弱小,英国占领印度后,对其民族、宗教、种姓实行“分而治之”政策,同时,采取行政与社会分离的原则,对印度政治生活、联邦制和议会多党制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三,印度教中的超自然主义传统使印度对专制君主缺乏绝对服从和拥戴的文化思想基础。最后,种姓制度制约国家权力,使政治与社会分离,形成类似西方政体中的权力均衡和利益分享的原则。所以,印度议会民主制的建立是由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而印度中产阶级的价值理念正符合这一历史趋势,并推动和促进着印度议会民主制的建立。另一方面,印度中产阶级对自由的向往和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取得的胜利让他们充满了乐观主义,认为印度凭借本国的经济力量能够自力更生,并摆脱外国的政治控制。

第二,对政教分离、建立世俗国家思想的认同。印度独立后,国大党坚持建立“世俗的、民主的共和国”的原则,而且将“世俗化”赋予很强的印度特色,即主张政治非宗教化,倡导宗教的宽容精神,强调各民族、各教派之间平等共处,最终消灭种姓制度和教派主义,使政治理性化。“正在抬头的中产阶级是具有政治上的倾向的,并不大向宗教方面去追求;但是他们想要依附某些文化根源,寻出一些东西以保证他们自己的价值,并且减少一些外国征服和统治而产生的失望和屈辱的情绪。”^[9](第448页)这里所说的文化根源很大程度上是甘地——尼赫鲁思想的遗产,因而印度中产阶级很容易地接受了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国大党的建国原则,即坚持政教分离,建立世俗国家。

中产阶级对这一思想的认同对印度发展有着积极意义。一方面,印度独立时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很发达,印度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和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政教分离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印巴分治时带来的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把国内的主要矛盾从教派主义、宗教冲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另一方面,在印度教传统中有着一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教义,如它缺乏强有力的、明确的个人伦理道德中心,没有统一的道德体系,强调个人利益高于社区等等。印度中产阶级接受世俗主义,也就意味着宗教传统对他们的束缚的放松,他们接受了社会道德的作用,认为公共生活中应该保持正直、廉洁,他们所形成的这种公德意识开始影响整个国家。

第三,“非暴力”思想和关心穷人。“非暴力”思想是印度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内容,这一思想的重要来源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思想。“甘地不仅扩大了党的号召,要将群众包括在内,而且使中产阶级的观点更印度化。”^[10](第328页)甘地认为“非暴力在积极方面的意义就是自觉地忍受苦难。这并不是说伏伏贴贴地服从坏人的主意,而是说用自己的整个精神去反对专制魔王的意志”^[11](第87页)。非暴力抵抗的方法虽然名称上是消极的,却是一种有推动力量的方法,不是怯弱逃避行动的口实,而是勇敢

的人对坏人坏事和对民族压迫的反抗。甘地非暴力学说的出发点和核心就是爱,让人们以爱制恶,以德报怨,以精神的力量反对物质力量。

印度中产阶级对“非暴力”思想的接受,使他们主张政治改良主义,反对暴力革命。这样一方面使统治阶级可以逐步地推动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又可以避免因剧烈的社会变革所产生的种种压力;另一方面,也不会因为剧烈的社会变革导致无法承受的利益损失。另外,印度中产阶级继承了“仁爱”的思想,他们认为国家和社会都应该为穷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工作,并且认为对财富的炫耀是一种不好的体验,而且是与像印度这样贫穷的国家不相符的。

(三)中产阶级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是政治稳定的政治基础

印度中产阶级随着自己力量的壮大,他们的影响力也在增强,他们虽然不能够对社会的发展起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领袖代表或政党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方针的选择。

印度国大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产阶级的利益。尼赫鲁在其自传中坦白地写道:“我的政治思想是我的阶级——中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当时风行的政治思想全是中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就在现在也多半是如此),稳健派和极端派都同样代表中产阶级,采用不同的方式谋求改善中产阶级的地位。”^[11](第 55 页)。作为最为杰出集团的律师、拥有土地的上等阶级、新闻工作者、教育家组成了国大党领导机构的主要成员,国大党支持的基础主要限于城镇的中、低等中产阶级。

另一方面,规范国大党政策的人大都出身于中产阶级,不论他们是自由派或国大党人士,他们都出身于同一阶级,并且是在同一环境中长成的,他们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以及结交的朋友是相似的,并且最初在他们公开宣称的两种资产阶级理想之间也没有多大区别^[11](第 473 页)。虽然甘地主义的盛行使国大党扩大了群众基础,国大党自称代表群众,但它未曾为农村人口的大多数提供加入党组织的直接机会。在整个独立前的时期,省和县级的国大党委员会都掌握在占支配地位的拥有土地的各种姓以及与他们结为同盟的中等阶级城市知识分子、企业家和商人手中^[12](第 33 页)。所以,国大党并不完全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它实质上是中产阶级的基地和堡垒。

印度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主要是通过其领袖代表尼赫鲁和国大党,同时对国大党的政策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功能。关于发展道路,印度选择了一条介于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中间道路”,实施西方政治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制,实行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防止过分专权。印度对议会民主制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尼赫鲁思想的影响,尼赫鲁在自传中承认:“就我个人来说,我在思想方面深受英国的影响,因而永远不能和它完全分开。同时,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摆脱我在英国学校和大学里所养成的那种思想习惯以及在对其他国家和生活进行一般评价时使用的那种标准和方法”^[11](第 477 页)。印度中产阶级在支持议会民主制的建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经济上,印度独立时国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农业凋敝,工业停滞,国家经济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而印度中产阶级随着其力量的不断壮大,他们本身也有发展经济的需要。印度开始实施五年计划,其基本目标是:“沿着社会主义路线发展,以确保迅速的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减少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防止经济权力的集中和创造自由平等社会的价值和观念”^[13](第 251 页)。农业实行取消中间人地主的土地改革,有 40% 耕地面积的土地转移到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手中,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并促进了印度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二五、三五计划强调优先发展以机械制造业为中心的重工业。

在思想文化上,尼赫鲁时期国家极力倡导的社会公正、社会均等和消灭贫困等思想被中产阶级所接受,他们开始关心穷人,认为国家的政策应该照顾到穷人的利益,反对两极分化。在对外关系上,因为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决定了他们渴望社会的安定,不希望有大的政治变动,希望各国之间能够友好和平共处,使自己国家的发展有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因而尼赫鲁时期印度的外交政策选择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不结盟政策,这些对维护国内的政治稳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印度在尼赫鲁时期能够保持政治上的高度稳定,不仅仅是因为尼赫鲁个人的魅力,中产阶级在思想、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印度中产阶级的发展、

壮大以及他们的价值取向、对国家方针政策的影响为政治稳定提供了社会前提、思想保证和政治基础，对政治稳定起着积极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 VIDICH, Arthur J. The New Middle Classes Life-styles, Status Claims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M]. British: Macmillan Press, 1995.
- [3] [美] C·赖特·米尔斯.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 杨小东, 等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 [4] [美] 戴维·伊斯顿.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 王浦劬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 [5] [美] 塞缪尔·P·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9.
- [6] 孙士海. 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7] Pavankvarma. The Great Indian Middle Class[M]. India: Penguin Books, 1998.
- [8] 赵中建. 战后印度教育研究[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2.
- [9] [印]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印度的发现[M]. 齐文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6.
- [10] [美] 斯坦利·A·科查内克. 印度国大党——一党民主制的动力[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 [11] [印]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尼赫鲁自传[Z]. 张宝芳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 1956.
- [12] [美] 弗朗辛·R·弗兰克尔. 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M]. 孙培钧,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13] [印] 鲁达尔·达特, K·P·M·桑达拉姆. 印度经济: 上[M]. 雷启淮, 等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

(责任编辑 叶娟丽)

Middle Class and Political Stabilization

——Commen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Middle Class and
Political Stabilization in Nehru's Period in India

NIU Hui-juan, HONG 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NIU Hui-juan (1978-), female,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majoring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between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Western modernization; HONG Ming (1955-), fe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majoring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between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Western modernization.

Abstract: India was one of the poor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ith its slow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ehru's period, but it kept efficient political stabilization, the middle class played the important role. Positive effects were as following: the great strength of middle class was the social base of political stabilization; its value orientation was the ideological base of political stabilization; its effects on the country policies supplied the political base for political stabilization.

Key words: middle class; political stabilization; Nehru; value orientation